

## 漢唐時期中國佛教史簡介

（參看附件：《漢唐時期中國佛教諸宗祖師及大事簡介》）

了解佛教發展史，對了解教義的發展規範、經典的集結背景、文化背景、修行背景，會有很大的幫助。佛教能夠在中國生根發芽枝繁葉茂，過去的祖師大德們做出了非常卓越的貢獻。佛教豐富的經典，流傳至今，是祖先們留下來的寶貴財富。歷史上從來沒有一個時期能像今天這樣，能夠讓人簡單而全面地獲得如此豐富而寶貴的修學資源。

不用說千百年前，就是五十年前，也是不能想象的。

應該珍惜這個時代賦予我們的得天獨厚的資產。

學習《華嚴經》不但需要對佛教的整體教義有概括性的了解，同時對經典的語言、結構和實踐模式，眾多的經論原文及其集結的背景，進入中國的時代，祖師大德們的著述背景，有比較多的認識。對這些了解得越是詳實，越是細致入微，越能從中汲取出經典本源的精髓，從而過濾掉許多由於文化差異、時代背景帶來的解讀上的偏差。

如果能夠把佛教放在整個的時代背景下來看，比只是從宗教宗派的角度來看，會給我們帶來非常不一樣的感受。我們介紹大乘經典的解讀模式等等，對時代背景和文化背景的了解，是非常不能缺少的。

下面分三個階段，簡單介紹一下佛教在中國發展的歷史：

- 鳩摩羅什大師來華之前
- 鳩摩羅什大師至玄奘大師之間
- 玄奘大師之後

### 一. 鳩摩羅什大師來華之前

雖然記載着佛教出現於世的經典，在中國可以追溯到公元前，甚至可以追溯到春秋戰國的孔孟老莊時代，但是佛教被正式請進中國，是東漢永平 67 年，以竺法蘭和攝摩騰兩位尊者的到來為標誌。

就在那時，中國的第一座佛教寺院——白馬寺，誕生了。

佛教進入中國，並不意味著大批的經典隨之而到。真正譯經時代是從安士高大師和支樓迦讖尊者那個時代開始的，比竺法蘭和攝摩騰兩位尊者的到來，差不多晚了上百年。

安士高大師是公元 147 年到洛陽，而支樓迦讖尊者更要晚上 20 年。

安士高大師翻譯的主要是上座部經典，而支樓迦讖尊者翻譯的主要是大乘經典。值得註意的是，兩位大師都不是中土人，安士高大師是安息國人，差不多是現在的伊朗，而支樓迦讖尊者是當時的大月支人，差不多是現在的阿富汗。

大月支人本來應該是目前中國西北部地區的遊牧民族，後來被匈奴趕到了西部再往西。這是西漢時期張騫出使西域之前的事情。張騫出使西域就是為了聯合西遷的大月支人來共同對付匈奴，費了很大勁也沒成功，但是他出使西域走過的那條路，如今卻家喻戶曉，那就是絲綢之路。

後來的玄奘大師到印度取經，走的就是這條路。

張騫出使西域比兩位大師到中國譯經早了差不多 300 年。

兩位大師翻譯的經典，有的流傳至今，而有的已經遺失。在那個時代，任何一點社會動亂，任何一次事故，都有可能使寶貴的書籍湮滅在歷史的長河中。今天的人們，頃刻間能讓圖文傳遍全世界的每個角落，實在不能想象，從古至今，那些尚存的經典，是經歷了多少的磨難之後，才得以幸存下來。

兩位大師之後又過了一百年，康僧凱大師到中國，我們目前的《無量壽經》原譯本之一，就是他翻譯的。康僧凱大師並不姓康，他是古時候的康國人，是今天烏茲別克斯坦境內的撒馬爾罕(Samarkand)附近。那是非常有故事的地方，帖木兒大帝就出生在距離撒馬爾罕不遠的一個小城，叫做沙赫裡薩布茲(Shahrisabz)。玄奘大師西行取經曾經來到這裡，那是康僧凱大師之後的差不多 400 年了。玄奘大師的《大唐西域記》有些記載。

可以肯定的是，目前佛教行者腦海裡，這些溫文爾雅的大師的形象，和他們的實際形象應該相差很大。

康僧凱大師之後的一百年，是道安法師活動的時代。

道安法師是東晉人，在中國的佛教史上，他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標誌。是他提出了出家人釋姓的主張，一直延用至今。而在此之前，出家人的姓氏都隨老師或者隨所從來國，天竺來的就姓竺，前面提到的安士高大師，來自安息國所以就姓安，康僧凱大師來自康國就姓康，支樓迦讖來自大月支，自然就姓支。

佛經的大分三科（序分、正宗分、流通分）也是他老人家提出來的。

除此之外，道安法師還建議苻堅到西域迎請鳩摩羅什大師，從而帶來了佛教在中國的改變。

但可惜的是，道安法師並沒有見到鳩摩羅什。

在道安法師古稀之年，曾極力阻止苻堅攻打東晉，但是無濟於事。最終發生了歷史上的淝水之戰，苻堅帶領 80 萬大軍討伐東晉，而東晉出奇制勝以少勝多。這場戰爭導致了前秦的衰落。留下了“投鞭斷流”、“草木皆兵”、“東山再起”這些成語，被人們熟知。

淝水之戰之後兩年，也就是公元 385 年，道安法師圓寂。

又過了 15 年，鳩摩羅什輾轉到了長安，那時候，大師已年近古稀。

羅什大師之前的佛教經典翻譯，很多都受到了中國本土文化的影響，特別是道家思想的影響。佛經中的“無為”，“道”都是直接從道家那裡拿過來的名相。不少佛門弟子本來就是學道的，後來又轉入了佛教。這其中，甚至包括道安法師。

道安法師的弟子，淨土宗的慧遠大師亦是如此，在慧遠大師的註解中就有非常明顯的道家著作的痕跡。在講習佛經的時候，遇到弟子們有不明之處，慧遠大師甚至會用道家的思想來加以說明。

而這種情況，到了羅什大師的時候，亦延續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，羅什大師的弟子，僧肇大師的著作中，不但行文模式，甚至用詞上，都和《道德經》一模一樣。

站在我們今天來看，特別是從一個虔誠的佛教徒的角度來看，這樣的做法可能是有問題的，但是放在當時的環境下，卻看不出來有什麼不妥。

為什麼？

第一，從佛教傳播的角度看，佛教進入中國，是外來的文化，需要攀附中國本土的思想才能得以生存，這種用儒家道家文化解釋佛經的方法，給人感覺是很親切的。佛教成了中國文化的補充。

第二，既然佛教是外來的思想，如果完全強調佛教與中國本土文化的差異，而要保持其系統的純潔性，勢必和中國本土文化產生沖突。不根植於中國文化的土壤，這種佛教文化是走不遠的。

第三，佛教的教義中，非常注重隨緣現量，核心的教義不能變，形式可以變。中國文化特有的無為思想和謙和的儒家環境，為佛教的中國化，提供了得天獨厚的土壤。

我們現在回頭看看就能知道，佛教發源於印度，曾經繁榮於中亞，如今它已經紮根於中國，枝繁葉茂子孫滿堂，我們甚至於感覺不到佛教是來自異邦的印度。可是佛教那些曾經播撒過的地方，佛教卻消失得無影無蹤。比如安士高的故鄉安息國，康僧凱的故鄉康國，支樓迦讖的故鄉大月支，還有健陀羅（阿富汗的坎大哈）、白沙瓦、迦師彌羅（今天的克什米爾），如果沒有考古學者們在深山叢林中找到的寺院遺址，人們似乎不知道佛教曾經在那裡大放異彩。

可能非常多的佛教弟子並不知道，我們認為的很多來自天竺的梵文經典，其實有非常多都是中亞的文字寫成的，並非印度的梵文。很多來華的譯經師，他們帶來的佛教經典，絕大多數也都是已經從印度梵文翻譯成中亞語言之後的版本，甚至直接就是在這些地區集結的，連梵文翻譯這道工序都省了。當然，在那個時代，梵文和中亞的文字，並不像當今的中文和法文差別那麼大，他們之間非常貼近。對於這些文字下的版本，語言學家，可以通過翻譯過來的用詞，以及能夠找到的一些留下來的古代經典殘片，判斷出來那一部經典來自哪個時期的哪個地區。這可能有點超出了佛教徒的感情所能接受的範圍，在很多人看來，經典“必須”要是從印度來的，甚至“必須”是梵文的。其實，從源頭上說，梵文是婆羅門教常用的文字，而今天的巴利文則可能更接近佛陀本人的語言。

願望並不能代替事實，盡管非常多的人相信願望就是事實。

佛陀本來就允許用不同的文字集結經典。佛陀甚至反對刻板的只用一種文字來書寫他的話。實際上，就算是從印度直接來華的經典，他們的語言

也是不一樣的，印度不像中國，秦以後的文字是統一的。印度那個地方，從來沒有過統一的文字，各個地區的成就者們，當然都是按照各自的語言來集結佛經。佛陀的意思是，法義必須要準確，文字怎樣都可以。

這樣看來，佛教翻譯中同義而不同用詞就是必然的了。

關於經典文字考證的問題，已經超出了佛教史，就不再多說了。

總之，這確實要感謝中國的祖先，創立的博大精深的東方文化，佛教到了這片土地，真正找到了生存的土壤，歷經戰火依然璀璨。

但是，這種如今看來平靜的背後，也曾有過無數次的坎坷與曲折。

中國的儒家和道家的護持者，都曾經對佛教的傳播，產生過強烈的對峙，這種對峙或者來自民間，或者來自高堂，理論上的風雨對抗換來了各自的發展壯大。也正是因為這種無數次的對撞，不但使得佛教在不斷調整中，找到在中國生存紮根的方法，中國的儒家和道家的理論，也同樣得到了非常大的促進和完善。一千七八百年前記載下來的文化撞擊，今天看來甚至依然驚心動魄，但是留下來的卻是碩果累累。有些外來的宗教或者文化，因為不適應中國的文化土壤，又不能自覺地調整自己，在中國文化中，沒有留下絲毫的痕跡，就好像是根本沒有到過中國一樣。與此相比，佛教和中國文化的融合，不論在中國史還是在世界史上，都是千載難逢的成功。

應該說，在鳩摩羅什大師到中國之前的佛教，是和中國的文化融合的階段，這三四百年的融合過程，讓中國人逐漸了解了佛教，接納了佛教。

佛教的經典在印度集結的時候，有著時間的順序，教義的形成和完善是按照時間的推進完成的。每一時代的成就者，都可以繼承他之前完整的佛教理論。但是經典進入中國，並不是按照他們在印度集結的時節順序來的。中國的行者們，看到的這些印度來的經典，很多時候在時間上前後錯位。這種錯位，會不會造成佛教理論中國化時教義上的偏差，是一個非常值得討論的話題。

站在現在人的角度來看，這種偏差一定是存在的，我們在以後的學習中會慢慢接觸到。